《史记》中为何有文字是倒着印的

王志勇

《史记》是金圣叹评点的六大奇书之一,不过金氏认为“奇”主要是指文辞精妙。其实在形式上,《史记》也有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那就是“倒书”。

细读过《史记》的人,大概都会注意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以下简称“《将相表》”)中有些文字是倒着印的。类似这样倒着印的文字,《将相表》中出现了将近70条。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买到错版书了?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印刷错误。因为目前所见的《史记》版本,无一例外都是如此。至于为什么要倒着写,着实是一个有趣却又难解的谜。

什么是倒书

《将相表》分“年代”“大事记”“相位”“将位”“御史大夫位”五栏,记载国家大事及人事上的变动。倒书是指“大事记”“相位”“将位”三栏中个别文字与其他文字书写方向相反,有些学者也称之为“倒文”。对于这种现象,自汉至明,未见有学者论及,直至清康熙时汪越首先提出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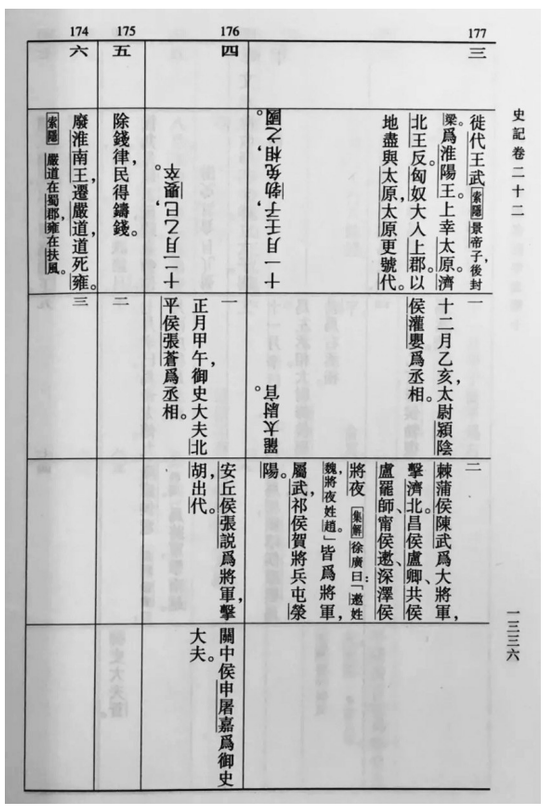
汪越在《读史记十表》中说:“《大事记》附表丞相薨、卒、免及自杀者何?重相也……不于《相位》书,而表于《大事记》,正以见相之重也。”又说:“然则太尉置、罢,表于相位而倒置,御史大夫死、抵罪、自杀,表于将位而倒置,何也?恐此或便观览,未必有深义也。”简单地说,汪越认为“大事记”栏中写丞相薨、卒、免等内容,是表示对丞相的尊重,而倒书是为了与皇帝、太后、诸王等主上的崩、薨有所区别。而“相位”“将位”两栏的倒书,他则认为就是方便阅读,没有特殊含义。

在汪越之后,众多学者如陈直、施之勉、李解民、张大可、周一平等人都就倒书问题发表了各自观点,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倒书有特别的用意,一派认为没有微言大义。为了解开读者们心中的疑惑,中华书局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介绍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凡是将相死、罢免等,在大事记中改换字的写法,即将字倒过来写”;第二种是“前一栏倒写的文字是下一栏的注释或帮助文字”;第三种是“倒文很有可能原来是写在简背面的,后人不明其义,转抄时就将简背文字用倒文的形式来表示了”。

我们认为这几种观点中,第二种应该是最合理的解释。凡是认为倒书有微言大义的观点,都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倒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死或者罢免,还包括其他内容。如“置太尉官”“罢太尉官”记的是官职的置罢,“青翟为太子太傅”讲的是官员的改任,“五月甲申,贤老,赐金百斤”说的是大臣致仕。这些内容都谈不上有什么微言大义在里面。若要弄清楚倒书出现的原因,还是要从倒书的具体内容入手。

出土简牍中所见之倒书

首先,要说明一点:上一栏倒书的内容,从本质上讲是属于下一栏的,这是大家都认可的。认为有微言大义的学者们,认为上提一栏是表示对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些大臣的重视。而事实上,倒书应该是古人书写时一种处理文句之间关系的方法。《史记》成书于西汉,最初应是写在竹简上的,所以出土的简牍中的倒书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史记》第1336页《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1993年6月,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三〇号秦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被整理者命名为《历谱》的一批简中,第49号简出现了倒书(李解民《〈史记〉倒文之谜》一文中已首先指出)。其文字如下:

丁亥 道长宿丁亥史除不坐椽曹从公 乙酉 甲申癸未 癸未

其中“道长宿”三字就是倒书。“‘宿长道’倒书在‘丁亥’日之上,表示此三字当属于正月丁亥日这一栏。”很明显,这枚简中出现倒书是因为书写空间不够,倒着书写是为了表示文字归属。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被动倒书”。

2002年,湖南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出土大批秦代简牍,其中编号为七六五的一枚,正面文字如下(从右至左):

卅四年九月癸亥朞癸酉三
卅四年八月丁未朞
蔓柏丞届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 七六五正

木牍正面“蔓柏丞届延卅四年八月丙申下”为倒书。按照时间顺序,八月丙申日之事应在八月丁未之前,而书写者倒书于牍之左下,我们推测,倒书的文字应该为后来补记。这一种倒书我们可以称之为“主动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应该属于“主动倒书”,因为有些倒书的下一栏根本就没有书写文字,所以不存在书写空间不足的问题。倒书只是告诉读者,这是属于下面一栏的内容。倒书的目的是区别于正书,表示不是同一时间书写,或者不是同一人书写,或者是表示所书内容不属于一类。

《将相表》中的倒书

《将相表》中的倒书共69条,可分为记大臣与记官职两大类。其中记大臣死亡的有38条,包括死、薨、卒、自杀、斩、腰斩、自刺杀七种情况;记大臣去职的有23条,包括抵罪、免、罢、老、夺印、改任六种情况。记官职的内容包括:罢太尉官4条,置太尉官3条,置司徒官1条。上述倒书内容,多数与正书内容密切相关。表中的正书所记,多为大臣任、迁、徙,另记大臣任职期间重要事件。仔细研究表中的倒书,我们发现,凡倒书者,大多数有与之对应的文字,且倒书之事在前(个别为同时),与之对应之事在后(个别为同时),或在同一年,或在次年,或后几年。在同一年对应者,倒书原应所属之栏(即下栏)有字,不在同一年对应者,下栏无字。下面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高皇帝四年“将位”栏倒书:“周苛守荥阳,死。”“御史大夫位”栏正书:“御史大夫汾阴侯周昌。”

高皇帝五年“相位”栏倒书:“罢太尉官。”“将位”栏正书:“后九月,绾为燕王。”

孝惠二年“大事记”栏倒书:“七月辛未,何薨。”“相位”栏正书:“七月癸巳,齐相平阳侯曹参为相国。”

以上三条为同年对应之例。周苛死在周昌为御史大夫之前;“罢太尉官”与“绾为燕王”可以认为一前一后,也可以认为是同时发生;“七月辛未”在“七月癸巳”前20余日。我们发现,倒书之文皆可以视为与之对应的正书文字的“背景材料”,或者说是“补充说明”。周昌为御史大夫,是因为周苛战死;“绾为燕王”,同时“罢太尉官”;萧何薨,故而曹参继之。

孝惠五年“大事记”栏倒书:“八月乙丑,参卒。”

孝惠六年“相位”栏正书:“十月己巳,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曲逆侯陈平为左丞相。”

征和元年“大事记”栏倒书:“冬,贺坐为盅死。”

征和二年“相位”栏正书:“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

以上二例是相对应的倒书、正书不在同一年之例。但所记之事相差也不过几个月,联系十分密切,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同一年,所以不能上下栏呼应。征和元年的倒书大概已经不是司马迁的原文,但体例一仍其旧。

从倒书的内容看,无论其在“大事记”“相位”“将位”中的哪一栏,都是记载大臣的结局,性质一样,不应该区别对待。总结说来,就是:正书言其始,倒书言其终,而其间的纽带是职官的更替。正书是经,见其更替;倒书是纬,补其不足。

《将相表》记事至鸿嘉元年,显然不可能是司马迁原作,到底是全部还是部分为后人续补,目前尚无定论。至于《将相表》中倒书的作者,可能是司马迁和后来的续补之人,也可能只是后来续补之人;倒书的书写时间,有可能是与正书一起完成,也可能在正书写定之后。这两个问题目前还无法解答,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尝试着去破解。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创新是从传统中诞生的

——读《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

李 静

近年来,在博物馆展陈设计方面,常常出现过分强调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的现象,使技术淹没了艺术,从而降低了艺术的格调。在设计中,如何平衡新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在继承传统中求“新”,我国著名博物馆展陈设计专家周士琦凭借自己从业60余年的经历,在《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一书中分享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和经验智慧。

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结集周士琦从业多年撰写的文章精品。这既是一部博物馆先驱的个人史,亦是中国博物馆陈列史,对我国博物馆界、文化艺术界,皆具有重要意义。

“少时家贫,喜欢画画,1947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靠救济金和助学金完成了学业。”周士琦在该书序言中表示,他始终谨遵徐悲鸿院长“尽精微、致广大,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的教导,将这一理念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虽然这句话谈的是中国画的创作,但他也指出了在艺术创作中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传统与创新的关联。

周士琦认为,创新是从传统中诞生出来的,做博物馆展陈设计更不应该盲目创新。在书中他也列举了一些失败的展陈事例,以警示后人。“1984年,故宫在对钟表馆的陈列设计上,则失之偏颇,出现了一定的问题。钟表馆设在故宫奉先殿内,当时为了追求所谓现代化的陈列效果,在古建大殿之中大兴土木,吊顶、裱糊壁纸、制作铝合金连壁展柜等,反而将大殿之中原有的珍贵浑金彩画和建筑结构全部遮盖,这样做不仅对原有的古代建筑造成一定的损害,而且使殿内陈列的展示效果大打折扣。”周士琦指出,这说明设计者的古代建筑保护意识十分淡漠,忽视了小环境与大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因过于强调现代化,而忽视了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辩证关系。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设计师则像一个导演,相同的内容通过不同个性的设计师之手,就会产生不同风格与感染力的作品。周士琦在书中多次强调,设计师的风格必须服从于博物馆的陈列设计,可以创造新的形式,但形式不能随意为之。它应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要依文物、展陈主题而定,依环境、历史文化传统而定,依功能结构、材料新技术工艺而定。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些地方甚至提出了“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当年开馆”的口号。周士琦表示,这是完全违背博物馆建设规律的做法,在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设计师更要静下心来,不能急功近利、脱离实际,不然仅靠“赶日子吃快餐盒饭”,是做不好设计的。在书中,周士琦回忆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一批学者和设计大家,如林徽因、莫宗江、张仃等参加国徽和开国大典相关陈列设计的往事,那一张张手绘的天安门示意图,以及张仃爬上脚手架,在第一现场指挥安装国徽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设计艺术的创造不仅在于设计师的专业技巧,还取决于他们身为高尚的心灵设计师所应具备的人文精神、进取精神、敬业精神和创造精神,这是周士琦所要强调的。

(周士琦著《跨时空的历史文化再现:中国博物馆陈列艺术60年》一书已由译林出版社于2019年3月出版)

《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1919—2019)》出版

本报讯 4月9日,七卷本《中国小提琴作品百年经典(1919—2019)》在2019年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首发。

100年来,经过几代音乐人的不懈努力,中国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小提琴作曲家和演奏艺术家,创作出大量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为全面梳理20世纪中国小提琴艺术创作的发展脉络,推动中国小提琴艺术的传播与发展,上海音乐出版社委托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教育家丁芷诺担任主编,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杨宝智担任顾问,将百年来的经典小提琴作品进行全面梳理。

该书出版历时4年。其间,编委会成员遍访全国著名专家学者,最终从500余首作品中甄选出79位作曲家的101首小提琴作品。图书采用编年体编撰方式,对每一首入选作品进行创作年代、时代背景等方面的标注,并附以作曲家生平简介。其中,不仅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19年创作的《行路难》,也有不少根据民歌素材创作的中国特色优秀作品,如茅沅的《新春乐》、黎国荃根据古曲改编的《渔舟唱晚》等。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在音乐“民族化”思潮影响下创作的《山区公路通车了》《沂蒙山之歌》《庆丰收》《二泉映月》等经典作品也收录其中。这些作品均附有音频,音频内容涵盖54位小提琴演奏家、45位钢琴演奏家及13个乐团。

据悉,与该图书同步出版的还有同名音像制品,共14张CD。 (黄艺芹)

“首都文化研究丛书”在北京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杜洁芳)4月1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建筑文化研究基地、商务印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城市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第二届京沪城市论坛暨“首都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

据了解,此次首发的“首都文化研究丛书”分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4个分册,对首都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释,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第二届京沪城市论坛上,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城市的本质内涵及其外延、城市研究的理论范式、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互联网时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等议题展开了多角度的学术研讨,从学理上反思城市研究,旨在推进中国城市研究的理论发展,为解决中国城市发展问题建言献策。

《三贤集》展现诗词之美

本报讯 (记者于帆)4月7日,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版权协会“远集坊”共同主办的《三贤集》新书发布座谈会在北京举办。

《三贤集》分别精选了当代中华诗词领域的知名作家刘征、沈鹏、周笃文的诗词代表作120余首,还精选了10名中青年作者的诗词代表作,结集出版。

座谈会上,94岁的刘征、89岁的沈鹏、86岁的周笃文分别就《三贤集》的出版、诗词创作经验谈了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刘征说,诗词作者要集中全力创作精品,青年人是诗词发展的希望。沈鹏认为,诗词必须言之有物、表达内容;诗词创作者要多点好奇心和创造力,并且要具备独立人格。周笃文认为,好诗一听就懂、一读就记得、自然入情,还能帮助读者打开眼界、洞悟世事。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刘征、沈鹏、周笃文都是当代中华诗词的重要代表,他们的创作入古出新,值得当代诗词界共同关注和研究学习。

《追寻初心》聚焦扶贫现场

本报讯 (驻陕西记者秦毅)近日,由青年作家、陕西工人报社扶贫干部杨志勇所写的扶贫札记《追寻初心》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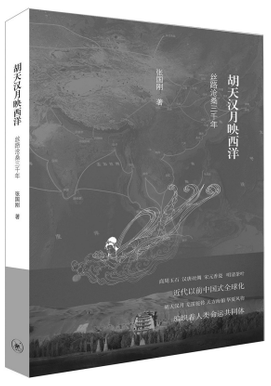
该作品收编文章88篇,共计20多万字,是了解当前农村现状的一个窗口,也是做好扶贫工作的一本参考书。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为该书题写书名。

《追寻初心》整体内容体现了作者在扶贫工作中的种种精神收获和作者深入体验生活的重大成果。细细品味其中的每一篇札记,皆是充满田野芬芳、草木本心和人生智慧的优美散文,既可见扶贫工作者的鲜亮初心、艰辛努力、顽强拼搏和丰盈的生命体验,亦可特别感受到乡亲的奋斗、幸福和快乐,还有乡村的变迁、美丽和忧伤,侧面记录了中国决胜脱贫攻坚的过程,各界众志成城扶贫攻坚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作者杨志勇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已出版散文集、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等10余部作品。

好书速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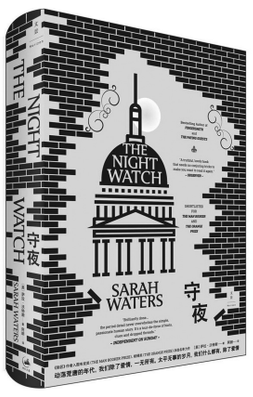
●《胡天汉月映西洋》



本书从历史与文化视角,重点讲述上古、汉至唐、宋至明、晚明至清中叶时期,“一带一路”的历史演进。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通过人物、事件、器物、艺术诸方面,深入阐述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解读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和影响。

(张国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2月出版)

●《守夜》



萨拉·沃特斯曾获毛姆文学奖,被英国媒体评选为“20位当代最好的英国青年作家”之一、“年度作家”等,文学评论界称其为“当今活着的英语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作家”。本书讲述了4个命运交错的伦敦人的故事,由战后的1947年,回溯至1944年,再抵达1941年,他们的人生际遇荡气回肠、牵动人心,作者抛弃奇情诡计,讲述了这些二战中平凡的“小人物”。

(【英】萨拉·沃特斯 著 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

●《北京1980》

这部长篇小说为读者讲述了一个绚丽动人的爱情故事。作者以真实细腻的笔触、优雅舒缓的叙事风格,为读者还原了北京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众多生活场景以及社会精神面貌。

(于晓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且读且思》

本书是由高考满分作文得主精心编选的一本作文素材大观,根据2014年至2018年高考作文题关键词分为15个热门主题,内容覆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科学等诸多领域,535则实用素材与636段深度讲解构成了这部61.6万字的厚重之作,是一本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力度的读写指南。

(白杏珏 赵慕宇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